

中国的郊区性:大城市郊区化发展动力、模式及问题

■ 胡小武 方佳瑞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大城市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城市郊区化发展成为大城市空间变迁的客观趋势。郊区化进程重塑了大城市内部的空间格局和经济地理,改变了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及活动模式,同时带来了城市新问题。本研究通过对郊区化动力机制的理论分析,结合中国大城市郊区化的具体形态,分析当前郊区化进程的社会后果,探讨中国城市化的郊区性特征,并展望中国大城市郊区化未来发展的可能趋势。

关键词:大城市郊区化;郊区;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TU984.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3.05.009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引言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大转型。工业化与城市化成为改变中国的重要引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改变了城市自身的空间结构形态和地理边界。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新型城镇化和城市郊区化的交互推动下,中国城市发展出现新模式与高速度。以城市交通干线不断完善为基础,大城市由向心集聚发展模式往向机分散型发展模式过渡。城市居民、工业企业、公共设施、大学校区、产业园区等主体由大城市主城区向外迁移,带动大城市外围区域的加速扩展,大城市全面进入郊区化发展阶段。

西方国家的郊区化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驱动作用下不断发展。当时,随着交通运输条件日益改善,带动了私家车数量不断增长。此时一些富裕阶层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基地项目“江苏大城市郊区化发展及其社会后果研究(22JD003)”阶段性成果。

为了避免中心区域的城市病问题,开始向郊区迁移,以追求更加优良的生活生态环境,是一种典型的自发性外迁。同时,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向郊区外迁以寻求更加低廉的土地,郊区也因此由起初单一的居住功能向复合型功能区发展。到20世纪50~60年代期间,在宏观背景及微观动力的持续影响作用下,西方发达国家的郊区化进入高潮。我国郊区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的城市中心区域有着较大吸引力,但此时的交通建设情况还不能完全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在起步当中。更多的企业因为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行而不得不向郊区搬迁,可见当时中国的郊区化进程是一种被动式外迁模式。大城市郊区化是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城市郊区化对城市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郊区化发展理论综述

(一)城市增长理论

城市的空间增长模式以郊区化扩散作用实现。作为城市化水平发展的必然结果,空间增长表现迅速,其过程体现在规模、内部要素、整体结构和形态等方面^[1]。城市的空间增长呈现以轴向和跳跃为主的城市发展模式^[2],具体包括城市人口数量增加、城市各产业发展升级、城市交通干线扩张完善等动态性增长。新时期,国家对城市规划有新的定位,城市空间和区域调整的变化带动了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同时,城市的生长又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扩散与聚集等阶段都有其自身的演化规律^[3]。城市增长的速度在当前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十分明显,城市不断向外延伸,城市外围和边缘区域都出现了不断增长的趋势,尤其在大城市郊区中更加显著。过去郊区中人烟稀少的荒地、农用地等出现了工业聚集区、商业区、大学城、社区等城市用地。面对城市中心区规模和资源使用限制的客观现实,城市新开发用地数量的增长将沿交通干线于郊区实现。

(二)城市扩散理论

城市扩散理论是城市发展的一种辐射效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郊区化发展阶段,离心力作用明显大于向心力作用,城市内部各要素呈现扩散现象^[4]。同时,大城市中心区的城市病问题逐渐累积,富人于是向郊区迁移。在美国,郊区化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内城人口的过度集聚,城市发展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诸如人居生活空间狭小、高犯罪率、交通堵塞,人们对郊区的新鲜空气和自然环境非常向往^[5]。大城市的城市中心区域发展到一定阶段,其资源利用效率不断降低,促使城市向外延伸和扩展,延伸到郊区进行开发建设。这种发展模式通常是由低密度、独立的住宅、商业和工业新聚集区域组成。城市受到市场作用、政府规划引导、社会环境状况、人文需求等因素影响加速扩散。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系列土地使用政策,成为城市扩散发展的加速器;同时,交通网络的建设完善以及居民出行交通工具的便捷升级,也为城市的扩散提供了直接的驱

动。大城市以多路径形式实现自身的扩散,中心区的技术、资本、劳动力等因素随着城市边缘扩散的趋势向外流动,与周边区域联系不断加强,拉动周边区域的发展,缩小城乡地区的经济差距。城市扩散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如交通拥堵、空气和水污染、资源浪费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等。

(三)乡村城市化理论

“乡村城市化”最早由马克思提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城镇化建设兴起时被引入。乡村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及劳动力不断分工的必然产物。乡村城市化是农村地区人口、经济要素、思想文化观念、社会生活方式等功能不断向城市靠近和融合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乡村人口的非农化;乡村土地性质转变为非农用地;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地域扩大;乡村生活生产方式及价值观念的城市化等趋同城市的过程^[6],呈现出乡村向城市集中且城市空间向外扩张的两种共同作用。突破城乡二元化发展模式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特点^[7]。乡村居民同城市居民共同创造和享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成果,在这一过程中缩小城乡差异,达到区域间的平衡性与整体性,实现城市和乡村的协同发展^[8]。可见这种城市化模式给乡村产业经济发展、新型空间结构以及社会变革带来了新的机遇^[9]。乡村城市化的蓬勃发展不仅仅需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人口性质转变聚集等动力要素推动,更需要面对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从而提升城乡发展进程中的社会治理能力。

二、中国的郊区化路径:城市要素从中心向外国迁移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稳步提高,郊区化是城市化相对集中后的高级阶段,表现为一种分散型的城市化模式^[10],是受到城市的内推力、外拉力和中介作用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中国大城市的离心扩散过程主要通过居住郊区化、工业郊区化、商业郊区化、大学城郊区化以及经济开发区郊区化等多路径实现(图1)。

(一)居住郊区化:人口向郊区外溢

居住郊区化是郊区化实现的显著路径之一。社会经济的发展带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居民对高质量居住要求不断增强是居住郊区化实现的内在机制。一方面,大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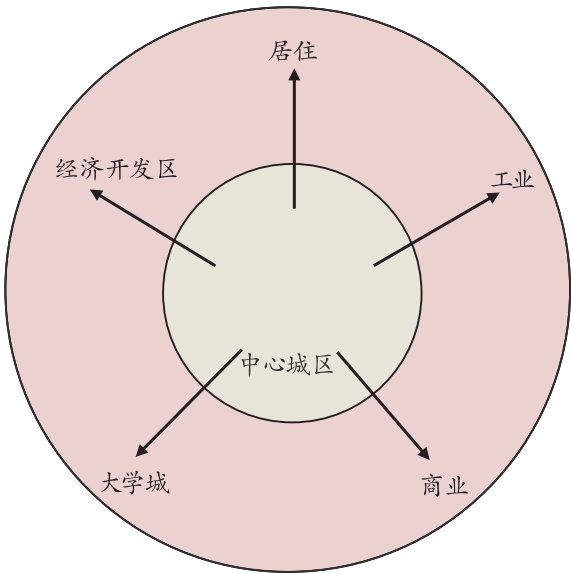


图1 大城市郊区化路径

的经济发展结构不断升级和转化,企业的土地使用成本大幅度升高,使得大量的原先布局在主城区的工业产业被迫外迁。工业郊区化的迁移落地继而带动了一部分主城区群体居住地选择的自然外迁;另一方面,郊区与主城区相比,具有人口密度低、环境污染小、生态环境优良、公共基础设施崭新等卓越条件,满足更多人对于居住条件的理想要求,继而为大城市人口分布产生郊区化扩散的格局提供了可能。同时,大城市郊区的交通条件的便捷、通信设施的升级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也是居住郊区化实现的必要条件和客观优势。随着人口居住郊区化水平的持续提升,郊区人口对通勤出行便利以及同城市中心区联系密切的需求也促使着郊区交通干线的升级建设,表现出郊区城市化持续发展的双向动力机制。

(二)工业郊区化:生产向郊区转移

工业郊区化是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下,大城市中心城区内的工业设施向郊区转移的过程。工业郊区化体现了大城市各种工业活动向郊区迁移并聚集的特征。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是郊区化得以实现的必然基础和根本动力,是郊区化的动力机制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业发展新阶段中,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在郊区建设大型工业发展区,并控制城中心的工业发展,这一城市发展规划的要求推动了更多的工业企业离开市区转移到郊区;面对大城市转型升级的加速,城市中的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以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服务业占据了大城市主城区的核心区位。因此,面对土地有偿使用的压力,工业企业不得不逐渐退出市区,让位于第三产业而向郊区聚集^[1]。工业郊区化的实现路径对于大城市的资源配置、人口和产业布局起引导性作用。大城市主城区的“去工业化”和郊区发展中的“工业化集聚”,已经成为大城市空间形态及产业迁移的重要特征。

(三)商业郊区化:消费向郊区扩散

商业本身的性质决定其选址和建设需优先考虑人口、交通及基础设施等关键因素。大城市中人口郊区化趋势以及郊区经济水平的提升带动居民购买力扩散,郊区人口对商业娱乐业的需求日益增加。大城市郊区相关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交通网络的便捷性等内部发展也会吸引更多人群的聚集,为商业在郊区选址、建设提供必要条件,商业郊区化模式实现扩大,成为郊区人口生活中文化娱乐所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外部驱动因素则体现在大城市市区地价过高以及市区中商业设施趋于饱和状态,郊区地域空间扩大相应地拉动了商业在郊区的落地发展。内外双重机制推动了当下大城市商业郊区化。起初我国工业郊区化带动着所属劳动力被动郊区化的实现,后又由于居民理想居住需求的提高主动向郊区转移,这一过程决定着商业郊区化的表现相对较为迟缓:一般在人口和工业郊区化之后^[12]。

(四)大学城郊区化:知识向郊区集聚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和城市辐射功能持续增强的大背景下,不少大城市的所属高校表现出由主城区向外扩散的大学城郊区化现象。高校在发展过程中设立新校区,

而这些新校区的选址大多集中在郊区并形成新的大学聚集地。大学城向郊区集聚是城市扩张高级阶段的结果。教育功能区的郊区化建设使得大学城以及师生人群与市区的互动模式发生了极大变化,同时高校和师生的新力量融入对城市郊区的经济发展、文化建构以及生态建设等方面带来了重要的积极发展动力^[13]。大学城的郊区化为郊区提供了人力资源和人口活力,带动大学城及周边区域的消费水平升级,尤其拉动了郊区第三产业的发展,郊区经济结构优化获得正向效应。同时,大学城郊区化集聚也对郊区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管理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如何更好地“促进高校与郊区的协调关系”^[14]对于郊区化长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五)经济开发区郊区化:产业向郊区集中

在我国,大城市的新区开发已成为城市空间区域扩大的主要方式,也是大城市郊区化的主要路径。开发区建设是城市经济开发建设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并行发展下的郊区化结果。大城市发展不断突破其主城区的规划范围和限制,基于城市的开发区建设来实现空间的大规模扩张,在城市边缘甚至更远的区域中寻求发展空间^[15],突破了城市发展空间有限的困境并以极具优势的区位位置作为发展动力,形成工业、企业等多功能集群,可见大城市郊区化水平在开发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得到提升;同时,开发区建设又以便捷的交通、完善的基础设施、优良的生态环境等优势为城市郊区化中的各功能聚集区提供空间运行的基础保障,加快大城市郊区的发展步伐,带动大城市实现更新演化。

三、郊区化的影响:中国大城市郊区化的新问题

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是城市空间增长、要素扩散和资源外溢的客观规律。鉴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特点和当前的环境承载能力,大城市郊区化进程在未来或将继续深化。面对大城市增长持续推动的郊区化发展,需要关注郊区化所引发的相关问题(图2),研究中国郊区化引发的社会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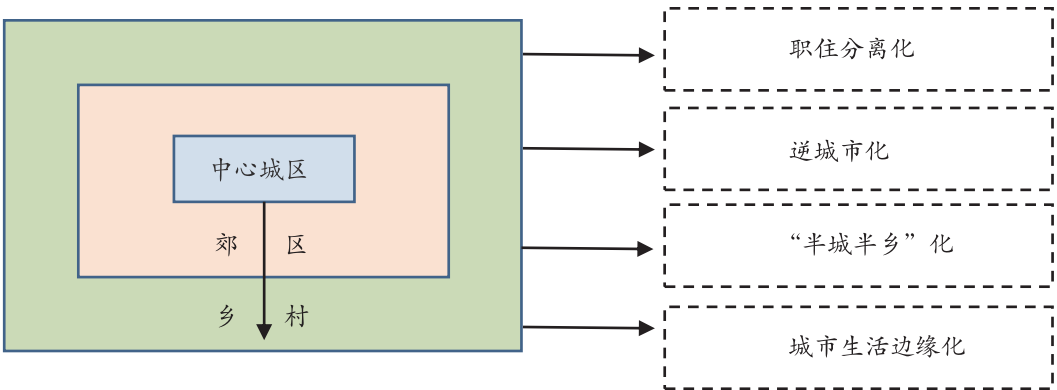


图2 大城市郊区化引发的新问题

（一）职住分离化：通勤工作群体增长

大城市郊区的建设发展带动着人口郊区化的不断深化,其中,职住空间错位问题显著。城市范围不断地向外延展,一方面,在政府主导作用下,工业企业从城中心向城边缘的郊区地带外迁;另一方面,在市场主导作用下,随着郊区商品房的开发建设,居民向郊区迁居,深刻影响着郊区居民就业和居住的相互关系,职住关系呈“网络+分散式”^[16]演变,就业和居住的不平衡特点凸显。

从郊区居民主体层面来看:大城市郊区的交通设施网络虽不断实现完善,郊区居住人口出行更加便利,但相较于老城区当前的交通建设成果仍有一定差距。在日常通勤中,部分郊区居住工作者“公交+地铁+步行”的多重组合造成通勤效率的降低。另外,郊区与主城区的位置距离较远,本身会增加郊区居民的通勤时间,导致郊区居民需要牺牲掉更多的个人时间用于通勤过程来加以弥补。同时,个人休息、娱乐以及陪伴家人的时间压缩,最终使得郊区居住的工作者生活幸福感降低,精神压力大,甚至严重时会产生情绪焦虑等问题,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轨迹。从城市交通层面来看,职住空间的错位起初被看作是有效缓解大城市主城区交通拥堵问题的有效方式:扩展通勤线路,疏散居住点,以降低主城区严峻的交通压力。但就目前的事实来看,职住分离现象同样会造成郊区与主城区之间的潮汐式交通高峰的堵塞,通勤者陷入通勤时间加长且效率降低的恶性循环圈。郊区以优良的生态环境作为独特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如今职住分离的交通需求使得大城市郊区的空气污染问题开始显现,原有的生态环境被损害。可见,职住分离化所带来的不平衡问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逆城市化：郊区成为新中心

逆城市化是城市郊区化后一个发展阶段的结果。城市化水平到一定程度首先会推动郊区化阶段的实现,继而出现逆城市化现象^[17]。逆城市化最早出现于美国。面对美国大城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问题的涌现^[18],城市人口开始流向郊区或农村等城市外部区域的社会化表现,它代表着城市的资源和空间结构的变迁。在中国,逆城市化现象最先出现在北上广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城市,“逃离北上广”可以说是逆城市化在当时最形象的口号。作为大城市郊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逆城市化所带来的效应是双面的:一方面,逆城市化有助于缓解大城市主城区及郊区人口的集聚问题,帮助实现大城市内圈与外圈的人口密度趋向平衡。同时,为了降低成本,一些企业选择向郊区或农村迁移,部分劳动力为获得所属企业的就业机会,前往郊区工作,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心城区的人口。另一方面,逆城市化对城市边缘的扩展在无序蔓延与侵占的情况下又会破坏城市边缘的生态环境,重蹈主城环境“走下坡”的旧路。人口迁移带来就学、就医、就业等新区域城市问题凸显,政府在治理投入和努力上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预见短期内的逆城市化趋势可能会面临治安管理压力大等多重城市问题。

（三）“半城半乡”化：郊区混合社会结构

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突显大量的“半城半乡”化问题矛盾。大城市郊

区化延伸到城乡交界处,形成一片城乡边缘区。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域位置空间,其兼具了城市和乡村资源的融合性特点,城乡交互作用强烈,经济、社会等问题多元复杂。“半城半乡”化问题体现在空间位置上的“半城半乡”和文化认同中的“半城半乡”两个部分。在空间位置问题上,城乡边缘区不同于单纯农村区域的最显著特征是其非农化程度高。鉴于其地理位置的边缘化特征,低价地的优势可以带来更大的企业经营效益,因此第二产业占据了大部分位置。农民兼业情况广泛但多为低水平、低技能的就业类型。“半城半乡”化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其应对混合多元化的特殊性,当前许多城市暂未发展出针对这一复杂城乡问题的高质量社会组织管理模式,导致城市管理效能弱,甚至出现公共管理服务缺失的现象,不利于城市边缘区域居民权利的保护,继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具体体现在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缺失等一系列问题。尤其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方面,城郊农村地区整体资源和动力不足,人口流入带来的新增资本尚无法弥补城乡资源差距,因此“半城半乡”格局未能改善城乡差距,在一些地方甚至加剧了资源错配问题。

在文化认同问题上,城市居民的郊区化迁移延续城市生活方式,文化适应的阻力较小。但部分边缘郊区的农村居民为了争取更高的经济收入、更稳定的经济来源,积累更多的家庭经济财富,主动脱离依靠多年的农业生产土地而转向城市中的非农业领域,从事非农业就业^[19]。在新领域就业的前期阶段被动接受大城市郊区中多元的生活和文化方式,很有可能产生该群体身处城市但缺乏文化认同^[20]、空间混乱和社区排斥等相关的矛盾问题。文化共识难以达成、较难实现新文化的真正融入,从而产生孤独和不安的情绪,甚至会进一步产生相关社会问题,不利于个体及集体的环境稳定。农村郊区居民需要尽快融入城市社会,建立新的社交网络为支撑,学习新文化知识和技能。此外,政府和社会也应该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身心支持和帮助,带动他们更好地适应和融入新的城市环境,更快地塑造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城市生活边缘化:郊区生活的窄化

城市边缘地区作为城乡统筹与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区域,也是观察和研究我国城市化机制、城乡结构转型等问题的一个重要角度^[21]。城市生活边缘化是城市郊区化过程中持续向外延伸的现象之一。大城市中各功能区、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建设由中心区域向外扩散,受到城区历史文化和开发时间悠久或短暂等不同程度的影响,城市内涵等级也呈由内至外逐渐递减的趋势。可见,随着大城市郊区化的扩展,外围区域有着鲜明的“边缘化”特征。其中主要包括交通边缘化、物质边缘化、空间边缘化和社会边缘化等层面。大城市边缘郊区的交通网络设施随着郊区人口的增加、郊区居民出行需求的提升不断地进行开发升级,郊区到市区的网络干线交织逐渐扩散密集,但相较于主城区主干线的建设成果,城市郊区中的交通建设完善仍需时间积累,这就造成了郊区交通边缘化的特征。同时,郊区人口就业、医疗、娱乐等需求有待满足,大城市郊区也在以主城区基础设施建设成果为目标持续追赶,但也需一定期限才能够真正满足居民以基础设施为根本

的物质化需求,继而代表着目前以及较长一段时间的郊区将存在着边缘化的特征。空间边缘化体现在大城市郊区像是一座“离岛”,它与中心区域有着一定的距离^[22],而这种距离既可以是距离的量化体现,也可以是对距离的定性描述。大城市郊区居民欲介入更多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等相关活动,需要以较多的通勤时间和精力去跨越这片较为“孤远”的区域;反观城市市区居民则较少主动到郊区去参加相关活动的需求,他们可以在主城区范围内以较少的时间和精力满足需求与达成目的,这种动机不对称所造成的单一空间方向的流动最终会造成大城市郊区空间上的疏离感和隔离感。此外,郊区位置远离主城区,郊区居民参与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机会也会随着距离增加而大大减少,甚至区隔于主流区域之外。可见,大城市郊区人口在逃离市区污染、交通拥挤、地价较高的因素之下,将不可避免地舍弃和丢失部分多元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大城市郊区化形成较多工业企业聚集地,更多的工业企业员工定居于大城市郊区的边缘区内,形成一个固定且密集的工业劳动者活动交流区,强关系加强的同时也使得不同类型弱关系的弱化,这是大城市郊区化中社会边缘化及生活空间窄化的人文体现。

中国郊区化所引发的职住分离、逆城市化、“半城半乡”化及郊区生活边缘化,有别于西方国家郊区化的相关特征,中国城市的郊区化发展积极高效,但在郊区性中也包含内生的问题,其中要特别关注逆城市化、“半城半乡”和郊区“离岛”化现象,需要加快从要素配置上提升郊区空间的生活品质。

四、思考：大城市的郊区化未来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持续发展,我国部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辐射带动力不断增强,甚至已经进入后郊区化阶段。大城市郊区摆脱过去单一的功能属性,功能集聚多元化优势使其逐渐演变成综合性的空间区域。大城市郊区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大城市郊区化的发展趋向又会对大城市未来发展与变迁产生系统性影响,因此思考大城市郊区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推动大城市及大城市郊区化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大城市的郊区化发展趋势是趋于停滞还是持续加速?郊区化产生的过程并不是城市化结束后的延续,而是在城市化过程加速阶段产生。这需要城市管理、社会治理做出预见性规划,及时判断和处理未来以及当下的郊区化发展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才能更科学地引导郊区化向良性趋势发展。受到政府政策引导、带动作用以及市场化决定力量的驱动,以人口、商业和工业等多种路径加速向大城市郊区聚集,大城市边缘功能区的形成和演化又给其自身提供强大的发展动能,实现从近郊区到远郊区延伸深化的趋势。与此同时,这种尚未成体系的粗放型蔓延模式又会给大城市及其郊区带来一定的发展阻碍^[23]。不论是工业企业集聚带来的污染、人口密集带来的拥堵、土地过度扩张资源利用低下,还是房地产下行产生的过剩问题等,都给郊区的发展贴上了混乱化、碎片化和复杂化的标签。同居民追求舒适安静、慢节奏和高质量的郊区空间特征背道而驰,大城市郊区化未来

可持续性发展规划的实现路径将面临新的问题及巨大挑战。在这一大城市郊区化高速发展的战略关键期,扭转问题深化趋向,完善郊区交通建设体系,落实郊区城市管理规划,优化郊区工业结构,构建郊区的综合性功能区域,避免郊区空间及其功能的无序化扩散蔓延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是决定大城市郊区化未来停滞或加速发展的关键。

我国城市处于高速发展态势,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拉动我国城市化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大城市中的主城区建筑密集及交通拥堵现象短期内未必能有明显缓解,仍需要依靠郊区化进程来缓解大城市的“城市病”状况,因此大城市会持续性推动边缘区域的开发和建设,吸引中心区域的多元化功能要素聚集郊区。为满足自我生存、生活高质量需求的内部动力,以及面对城市建设外延大趋势下的外部推力,越来越多的主城居民从主城区迁移到郊区生活,为大城市郊区化进程带来持续的人力资源与人口活力,从而保证大城市在后郊区化发展阶段中保持加速发展态势。

其次,新城区的开发是当前大城市扩张需求的重要载体,更是支持地方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之一^[24]。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步伐的加快,新城区建设也进一步成熟,不断推动着大城市城乡面貌的变化。政府在城市规划的宏观基础上,考虑城市经济、文化、人口、交通等建设基本要素,结合城市外围地形高低等限制因素确定区位范围并开展新城区开发建设。大城市边缘地区的布局使得新城区建设可以享受较市区更价廉的土地资源和更宽阔的土地空间,以新模式、新理念建设具有空间特色的集群。新城区以其多样化的功能类型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扩展中无序蔓延的问题。教育功能区和高铁新区等都是在城市外沿区域以聚焦某个功能方向加以扩展,甚至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多元生态发展圈,以多极化或组团等方式在城市中心以外的地区形成城市次中心,促进经济、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大城市市区与新城区之间有着强烈的联结关系,新城区建设初期需要依托市区多年以来形成的基础优势,以其多元化功能与城市中心、外延空间建立起互动联系网^[25],延续城市中心的生活方式、共享城市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生活;同时,新城区也为旧城区提供人口、交通压力的疏解功能,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中新旧城区的功能布局不断完善,最终带动新城区自身及城市中心的进一步发展^[26]。

最后,郊区化如果是离心城市化的第一个阶段,那么逆城市化则是离心郊区化的第二个阶段。城市化水平的持续提升会使得城市规模不断向外扩展,郊区化将会以外扩沿线为路径产生辐射带动作用,推动逆城市化这一阶段的加速到来。随着中心区域的集聚程度不断加强,逆城市化则是城市居民为缓解主城区生态环境破坏、人口密集拥挤、交通出行拥堵、生活节奏过快的方式表征,是大城市工业向城市外围寻找低廉土地和劳动力的迁移路径。逆城市化与城市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逆城市化发展将会给大城市主城区带来人口增长停滞甚至持续减少的影响,但它并非完全抑制城市化的发展,也不意味着城市区域结构的解体,而是适当地缓解在发展过程中“城市病”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压力。随着大城市郊区化当下或未来进入逆城市化阶段,居民和企业不断地流向城市外围,一方面可持续缓解大城市发展各方面压力,带动大城市资源的利用及整体布局优化;另一方面也会搭

建和完善更远的外围地区、乡村与城市的桥梁,使得城市中的资源、资金和技术等动力元素一部分流入边缘区,补充乡村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发展空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继而实现边缘地区中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并带动边缘地区与乡村的振兴,缩小边缘地区与大城市主城区之间的差距,以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总的来看,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正以新社会空间形态连接城市中心区与郊区外围乡村,形成城乡融合的新型空间区域——郊区新城。新型城镇化正是以新城的方式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中国的郊区化与美国以低密度居住区为主的郊区化不同,前者更具全要素城乡融合能力,具有典型的“逆城市化”特征。郊区化已经成为中国大城市向“大都市区域”演化的重要动力^[27]。比如上海的嘉定、青浦、松江等郊区新城与苏州的昆山、吴江等城市的生长,推动了上海与苏州逐渐走向大都市区域一体化形态。因此,政府主动推动的郊区新城建设,聚合了产业、就业、居住、交通等等“集体消费”产品^[28],最终促进了“产城融合、职住一体、生态宜居、交通便利”形态的新城,并接纳和转移城市中心的高密度人口,促进了大城市的健康发展。如此,大城市郊区化成为治理大城市病的重要战略举措。

参考文献:

- [1] Juan Carlos Garcia-Palomares, “Urban Sprawl and Travel to Work: The Case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 of Madrid” [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10, 18 (2): 197–213.
- [2] 周春山、叶昌东:《中国特大城市空间增长特征及其原因分析》[J],《地理学报》2013年第6期,第728–738页。
- [3] 胡小武:《郊区化居住模式的现实动力与深层问题》[J],《中国房地产金融》2006年第6期,第25–28页。
- [4] 吴国兵、刘均宇:《中外城市郊区化的比较》[J],《城市规划》2000年第8期,第36–39页。
- [5] 陆小聪、袁浩:《现代城市社会学》[M],上海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02页。
- [6] 孟卫东、吴振其、司林波:《乡村城市化发展的若干影响因素》[J],《重庆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47–55页。
- [7] 朱宇:《城市化的二元分析框架与我国乡村城市化研究》[J],《人口研究》2001年第2期,第53–60页。
- [8] 薛德升、陈文娟、侯启章:《有关“乡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等几个概念的辨析》[J],《城市问题》1998年第1期,第14–16页。
- [9] Robert A. Hackenberg, “New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0, 6 (3): 391–419.
- [10] 周一星、孟延春:《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趋势》[J],《城市规划汇刊》1998年第3期,第22–27页。
- [11] 郭建华:《对广州市工业郊区化的探讨》[J],《热带地理》1996年第4期,第345–349页。
- [12] 罗彦、周春山:《中国城市的商业郊区化及研究迟缓发展探讨》[J],《人文地理》2004年第4期,第39–43页。
- [13] 吴志明:《高校郊区化背景下的成都城市化进程》[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53–58页。
- [14] 梁爽、梁枫:《城校关系视角下高校郊区化的内在动力与效应研判》[J],《高教学刊》2022年第36期,第

67-70页。

[15] 郑国、周一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北京郊区化的影响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05年第6期,第23-26页。

[16] 张越、韩明清、甄峰:《对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再认识——从城市化阶段谈中国城市发展》[J],《城市规划汇刊》1998年第6期,第21-23页。

[17] 曹宗平、朱勤丰:《中国“逆城市化”背景下的“非转农”问题探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5期,第93-97页。

[18] 王宇冰、张丽莉:《西方逆城市化实质及启示》[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1年第24期,第17-19页。

[19] 易卓、桂华:《从“半工半耕”到“半城半乡”:农民城镇化的阶段与策略》[J],《江汉学术》2022年第1期,第52-61页。

[20] 冯川:《半城半乡:当代中国城乡关系发展模式再审视》[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3期,第107-120页。

[21] 唐伟成、彭震伟:《半城市化地区的发展特征与演化机制研究——基于江阴的案例》[J],《城市规划学刊》2020年第5期,第62-68页。

[22] 史春玉:《城市边缘社区:一个关系性概念分析框架的构建》[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第37-45页。

[23] 何玉宏:《中国城市郊区化进程中的蔓延危害及应对——基于美国的经验与教训比较》[J],《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12期,第38-44页。

[24] 汪劲柏、赵民:《我国大规模新城区开发及其影响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2年第5期,第21-29页。

[25] 张越、叶高斌、姚士谋:《开发区新城建设与城市空间扩展互动研究——以上海、杭州、南京为例》[J],《经济地理》2015年第2期,第84-91页。

[26] 张沛:《旧城改造与新区开发》[J],《城市问题》2000年第1期,第6-10页。

[27] 毛广雄:《大都市区化:我国城市化发展路径的转型》[J],《城市问题》2009年第6期,第15-20页。

[28] 武廷海、张能、徐斌:《空间共享: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城镇化》[M],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6页。

作者简介:胡小武,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社会学院副教授。方佳瑞,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陈丁力